

「建構」中國： 西班牙人1574年所獲大明《古今形勝之圖》研究^{*}

李毓中^{**}

大航海時代的開展，在連結全球貿易網絡的同時，也助長了人們「建構（making）」陌生地區人文與地理知識的渴望。1571年西班牙人在靠近中國的馬尼拉，設立他們的主要殖民據點後，1574年菲律賓總督Guido de Lavezaris便透過前往該地經商的閩南華商，取得了在福建金沙書院重印的《古今形勝之圖》。後來又在華人譯者的協助下，一名奧古斯丁神父將地圖上的相關資訊譯成了西班牙文，被Guido de Lavezaris寄回了西班牙母國呈給當時的國王菲力普二世（Felipe II），進而開啟了西班牙對中國與東亞地理人文知識的理解，亦為歐洲漢學的研究奠下一定的基礎。

本文除了對西班牙人獲得《古今形勝之圖》的過程，以及華人譯者的真實姓名進行研究與討論外，並藉由相關西班牙文譯本及中文原文的比對分析，探究華人譯者與西班牙譯者在異文化接觸交流過程中，如何靠著自身文化的想像或理解，來「建構」出一種西班牙人所能理解的「大明」。

關鍵詞：《古今形勝之圖》 中國 西班牙 菲律賓 華人翻譯

^{*} 本文的得以完成，金國平、湯開建、徐光台、林天人、汪前進、陳宗仁與邱馨慧等教授，前印地亞斯總檔案館館長 María Isabel Simó、館員 Pilar Lázaro de la Escosura、Isabel María Ceballos Aragón、Carmen Molina Pérez，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 博士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資料與意見，謹此致謝。此論文初稿曾發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主辦之「《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國際學術研討會」。最後，本文的得以完成，要感謝澳門文化局，以及國科會計畫「謨區查抄本研究：一份中西合璧手稿中的十六世紀末東亞世界」（101-2410-H-007-062-MY2）的獎助。

^{**}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前言

大航海時代的開展，在連結全球貿易網絡的同時，也助長了人們對於陌生地區人文與地理知識的「建構 (making)」；而有關中國的地理及歷史知識，不管是從非洲南岸經印度而抵達的葡萄牙人，或是經過美洲再橫渡太平洋的西班牙人，都是從馬可波羅之後的歐洲人努力希望取得的。

1571年西班牙人在發現「南海 (El Mar de Sur, 即太平洋)」¹半個多世紀後，終於在靠近中國的呂宋島馬尼拉，設立其主要的殖民據點，並因此與往來菲律賓群島的閩南華商取得了聯繫。而後在美洲白銀的吸引下，這些被稱為「生理 (Sangley)」²人的閩南商人，不但帶來了許多的中國商品，也帶來西班牙人夢寐以求的東亞資訊；一幅目前學界認為是由大明都御史喻時 (1506-1571) 製作，圖上標有「嘉靖歲次乙卯孟冬金沙書院重刻」，即嘉靖三十四年 (1555) 於福建重刊的《古今形勝之圖 (Carta de la configuracion antigua y moderna)》。

該圖除了讓西班牙人對於中國有所瞭解外，同時也增進了他們「建構」東亞地理知識的速度，進而為十六世紀西班牙的中國研究，取得了傑出的成果與領先的地位；或許是隨著歐洲人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國資訊，這張飄洋過海抵達歐洲的《古今形勝之圖》，最後便成為公部門的檔案，為人們遺忘。

據日本學者榎一雄的研究，這張藏放在西班牙塞維亞 (Sevilla) 印地亞斯總檔案館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的《古今形勝之圖》，³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再

¹ 在麥哲倫航渡太平洋之前，西班牙人將太平洋這一大片海域稱之為「南海 (Mar del Sur)」，「太平洋 (Pacífico)」一詞，最初僅用來指稱麥哲倫海峽西邊出口的海域，直到十七世紀才漸漸取代「南海」一詞。

² 有關「生理 (Sangley)」人一詞的討論，請參考李毓中，〈《印地亞法典》中的生理人：試論西班牙統治菲律賓初期有關華人的法律規範〉，收入於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8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頁327-380；李毓中、李鐵生，〈圖像與歷史：西班牙古地圖與古畫呈現菲律賓華人生活 (1571-1800)〉，收入於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9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5)，頁437-477。

³ 有關西班牙海外殖民地檔案的整理，以及歸檔至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過程，參考李毓中，〈西班牙印度〔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簡介〉，《歷史月刊》，115 (1997)，

度被人們發現，但立刻吸引了世界各地研究者的注意；因此，在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便有許多知名學者對此地圖有所討論，如Pablo Pastella、Ettore Ricci、Joseph Brucker、Santiago Montero Diaz、Pasquale D'Elia、中村拓⁴、Lothar Knauth⁵等。而中文研究者中最早提及此地圖的是已故的中西交流史學方豪，在他1952年伊比利亞半島西班牙、葡萄牙檔案館之行時，首先見到此地圖，並寫成〈流落於西葡的中國文獻〉一文介紹給中文學界。⁶

而後，則是1962年時任日本東洋文庫研究部長的學者榎一雄，完成〈古今形勝之圖について〉一文，該文不但傳抄、翻譯了1574年西班牙菲律賓總督Guido de Lavezaris寫給西班牙國王書信中，所附上的有關《古今形勝之圖》內容的西班牙文說明，並對《古今形勝之圖》的作者以及該圖在中國地圖史的脈絡及特色，做了極為完整與精闢的研究。⁷菲律賓學者Carlos Quirino則是將Guido de Lavezaris所寫《古今形勝之圖》內容的西班牙文說明，在1969年譯為英文發表出版。⁸在此之後，中文學界則有任金城、曹婉如、鄭錫煌、孫果清、李孝聰、周振鶴、金國平、吳志良及黃時鑒等學者，⁹皆對此地圖有所

頁 4-10。

⁴ 東亞學者對《古今形勝之圖》研究的濫觴，應是始於1933年日本學者中村拓的大作，見Hiroshi Nakamura, "Les Cartes du Japon, qui servaient de modele aux cartographes europeens au debut des relations de l'Occident avec le Japon," *Monumenta Nipponica* 2:1 (Jan 1939): 100-123.

⁵ Lothar Knauth, "Gu dyin hsing sheng di tu," *Asia. Anuario de Estudios Orientales* 1 (1968).

⁶ 方豪，〈流落於西葡的中國文獻（上）〉，《學術季刊》，1：2（1952），頁160，後收入於氏著，《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作者自行出版，1969），頁1760-1761。

⁷ 榎一雄，〈古今形勝之圖について〉，《東洋學報》，58：1、2（1976），頁1-48。

⁸ Carlos Quirino, "The Lavezares Map of China (1555)," *Philippine Historical Review* 2:1 (1969): 269-274. 不過當該文在結語處提出「Who was Chin-sha（金沙）？」、「Was he a map-maker or just a printer？」時，便可知Carlos Quirino雖是個傑出的西屬菲律賓史的研究者，但對於中國地圖此一研究領域，仍是較陌生的。

⁹ 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文獻叢刊》，17（1983），頁213-221。曹婉如、鄭錫煌、任金城，〈中國與歐洲地圖交流的開始〉，《自然科學史研究》，3：4（1984），頁346-354。任金城、孫果清，〈王洋題識與地圖朝鮮摹繪增補本初探〉，《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112-116。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33-34。周振鶴，〈西洋地圖裡的中國〉，收入於周敏民編，《地

研究與討論；但受限於這張地圖破損嚴重狀況不佳，印地亞斯總檔案館不對外開放原件的調閱，因此中文世界的學者對於《古今形勝之圖》的理解與研究，幾乎都得透過榎一雄的日文研究成果，而無法接觸到原圖及原始文件，殊為可惜。

直到近些年來，印地亞斯總檔案館將《古今形勝之圖》修復完畢，並予以掃描進行數位化典藏後，研究者方得以在不調借原件的情況下，毫無距離與阻礙的對此一珍貴的地圖進行更仔細的研究；與此同時，澳門學者湯開建找到一批1574年林鳳（Limahong）偷襲馬尼拉的中文新史料，恰好為我們理解西班牙如何獲得《古今形勝之圖》中文資訊的過程，找到可能的答案。¹⁰因此筆者撰寫此文，希望能對此一重大的人類文化資產，特別是紀錄西班牙人與華人在初次接觸時，如何突破異文化及異語言的障礙進行溝通的過程，做一個更為完整的研究與討論。

一、西班牙尋找東亞的歷史背景

相較於葡萄牙王室的積極鼓勵航海事業，西班牙王室則是受限於1479年與葡萄牙王室所簽之阿爾卡索瓦斯（Alcaçovas）條約；西班牙人雖因此取得葡萄牙王室不得繼承西班牙王位的承諾，但同時也被迫放棄了西班牙人在非洲加納利亞（Canarias）群島以南航行的權利，因此無法由非洲南岸航往亞洲，發展他們的航海探險事業。

幸運的是，之後西班牙王室靠著據稱是熱內亞人的哥倫布，以及葡萄牙

圖中國》（香港：香港科技大學，2003），頁 1-8。金國平、吳志良，〈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繪製背景及年代〉，收入氏著，《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頁 310-321。黃時鑒，〈巴爾布達《中國新圖》的刊本、圖形和內容〉，《文化雜誌》，67（2008），頁 69-80，後收入氏著，《黃時鑒文集 III》（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 260-272。

¹⁰ 請參考湯開建，〈劉堯誨《督撫疏議》中保存的林鳳及其與西班牙關係史料〉（發表於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辦、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與臺灣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協辦，「明清時期的中國與西班牙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2007.10.30-2007.11.02），後出版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迹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歷史研究》，6（2012），頁 43-65。

人麥哲倫的協助下，向西橫渡大西洋與太平洋，來到了他們始終陌生的東亞（含東北亞與東南亞）。但相較於十六世紀初便開始在東亞海域探勘與貿易，對於此區域已有初步認識的葡萄牙人而言，奉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Carlos I）之命出航的麥哲倫，他的船隊於1521年抵達菲律賓宿霧（Cebu）島時，只是探索東亞「建構」西班牙東亞相關資訊的開始。只是不久後，他便在與宿霧鄰近小島馬克坦（Mactán）原住民衝突事件中喪命，而使得原本或許可以藉助他取得葡萄牙人更多東亞資訊的捷徑，因此中斷。

在此之後，又有1525年的Loaysa、1526年的Sebastián Caboto、1527年的Alvaro de Saavedra Cerón以及1542年Ruy López de Villalobos的遠征隊先後航往東亞；而今日菲律賓群島一名的緣起，即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以當時仍為王子身分的菲利普二世（Felipe II）之名命名的。¹¹與此同時，在西班牙人試圖在東亞設立其殖民據點，以及探尋自太平洋西岸返回墨西哥航線的同時，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在東亞找尋中國、日本及琉球的所在地，例如1526年Sebastián Caboto從西班牙卡地斯（Cádiz）的聖路卡·德·巴拉梅達（Sanlúcar de Barrameda）港前往摩鹿加（Molucca）群島，其出航目的之一，即包括了尋找日本（Cipango）、中國（Catayo Oriental）、琉球群島（los Lequios）以及大韃靼（Gran Tartaria）。¹²

當然，從當時文件對東亞地區名稱的描述，便可知道西班牙人對於東亞的地理知識，仍是一片陌生，主要的知識仍是來自於馬可波羅的描述。¹³同

¹¹ 有關這些遠征隊背後所隱藏的地區商業團體利益衝突，可以參考 Juan Gil, *Mitos y utopías del Descubrimiento 2. Pacífico*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9), 13-69.

¹² A.G.I. (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Patronato, 41.

¹³ 日本（Cipango）、中國（Catayo Oriental）以及大韃靼（Gran Tartaria），應是得自於馬可波羅著作《馬可波羅行紀》的「資訊」，但琉球群島（los Lequios）可能是得自於葡萄牙人在馬六甲的資訊，例如曾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假冒馬六甲使臣來華的 Tomé Pires，在來華前於馬六甲所寫的報告《東方簡志（Suma Oriental）》中，便已提到了琉球群島，見 Rui Manuel Loureiro, *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 “Suma Oriental” de Tome Pires* (Macao: Instituto Portugues do Oriente, 1996). 另有中譯本，請參考金國平著，〈《東方簡志》新釋〉，收入《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頁 137-150；以及 Thomé Pires 著，何高濟譯，〈《東方志：從紅海到中國（Soma horientall que trata do mar Roxo ate os Chims）》（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等譯本。

樣的，Ruy López de Villalobos則是為找尋摩鹿加（Islas Molucas）與琉球群島，¹⁴於1542年離開墨西哥的巴拉·德·那維達（Barra de Navidad）港，但最後在與葡萄牙人發生一些小衝突後，被捕而囚禁在安汶（Amboina）島，後在1544年因熱病死於獄中。這些歷史發展，再再顯示十六世紀上半葉，西班牙人探求東亞資訊及立足東亞的挫敗。

直到1565年López de Legazpi自墨西哥率領遠征隊，航抵菲律賓的宿霧設立據點，並指派船隊出航找尋自東亞得以返回墨西哥的航線獲得成功後，西班牙人才總算在東亞有了立足之地。而在Legazpi鞏固宿霧殖民地的同時，便派遣船艦四處探察中國、日本等地的資訊，以及尋找更合適的殖民地，例如1570年其副官（Maestre de Campo）Martín de Goyet便在民都洛（Mindoro）島上的河流中遇到了一艘中國船，且當時華人就被「〔當地〕原住民稱之為『生理』人（que los naturales llaman sangleyes）」¹⁵。而在這份報告中，還提到他在馬尼拉遇到了四十名已婚的華人與二十名日本人，甚至有一名日本人表示他是天主教徒，名為巴布羅（Pablo）。顯然地，這些人可能已經接觸過同是天主教的葡萄牙人，也因此當1574年華人攜來《古今形勝之圖》時，西班牙人得以與華人就地圖的內容進行溝通；或許此時在海外經商的華人，已有一些人已能掌握某種程度的葡萄牙語。

二、西班牙人取得中國地圖的過程

Legazpi在考量與中國發展政經關係以及宣揚天主教的目標，同時又探知接近中國的馬尼拉為一人口眾多且富庶，再加上擁有優越的海灣等理想條件後，便於1571年率領艦隊向北出征將馬尼拉佔為殖民據點，翌年Legazpi過世，而由Guido de Lavezaris擔任菲律賓總督一職，繼續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探

¹⁴ A.G.I., Indiferente, 1528, N. 4.

¹⁵ A.G.I., Patronato 24, ramo 17. 轉引自 Patricio Hidalgo Huchera (ed.), *Los Primeros de Filipinas, Crónicas de la Conquista del Archipiélago*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1995), 266-267.

索與拓殖事業。¹⁶由於西班牙人從宿霧島北上的拓展過程中，與華人的商船曾有過數次的接觸，擁有白銀的西班牙人抵達菲律賓群島的消息，很快地便隨著這些華人的網絡傳回中國閩南一帶，於是在隔年的東北季風來臨時，逐利而往的閩南商人便載著中國商品，航往西班牙人剛佔領的馬尼拉。

據十七世紀末教會史學家Gaspar de San Agustin所記載：

前幾天三名去年（1570年）在明多羅（Mindoro）島受恩於先行者而獲自由的中國商人，搭乘中式帆船抵達馬尼拉，這三名商人當中有一人相當機靈，精於算計，在戰地軍隊中幾乎無人不曉，他告訴先行者（Legazpi）說當他回到中國時，便向大明（Taybin）的長官（gobernador），也就是他所居住地區的長官稟告受到西班牙人殊厚禮遇的事……。

中國人用中式帆船載運來各式花色的緞布、多種厚薄塔夫綢、軟真絲、大疋生絲、鐵、高級瓷質杯碗。亦帶來大量水銀，從中國商人當時的報價看來，他們先前似乎已經向某位西班牙人打聽過水銀在新西班牙（Nueva España）¹⁷每擔（quintal）¹⁸的價格行情……。¹⁹

由此可知，在華人與西班牙人進行貿易後，雙方也同時展開了更多的接觸，除了華人想探詢西班牙人對於商品的需求外，西班牙人也想獲知所有中國的資訊，如Gaspar de San Agustin所言：

〔1572年〕……教士會議（Capítulo）召開期間，另外兩艘來自中國的中式帆船抵達了馬尼拉，雖然它們沒有如同之前來此的其他中式帆船一般，載來如此豐盛又多樣的貨品，但隨船前來的中國商人說明，這是由於他們不清楚西班牙人的喜好和需求，此番前來只是為了進一步瞭

¹⁶ 有關西班牙人在東亞的拓展策略與過程，請參考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和臺灣（1565-1642）〉，《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樂學書局，2001），頁31-48。

¹⁷ 指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區。

¹⁸ 古時西班牙所使用的重量單位，一擔（quintal）約為46公斤重。

¹⁹ Gaspar de San Agustin, O. S. A.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1565-1615)(Madrid: Manuel Ruiz de Murga, 1698), 這裡我們所引用的版本是1975年由西班牙科學調查研究最高委員會（C. S. I. C., 相當於此地的國科會）整理後出版的版本，見 Gaspar de San Agustin, O. S. A.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1565-1615), edición introducción, notas e índices por Manuel Merino, O. S. A.(Madrid, C. S. I. C., 1975), LIBRO 2, CAPÍTULO VIII, 359-360.

解交易的運作，同時也提及他們那幅員遼闊的中華帝國有著各式絕妙逸品……。²⁰

或許是由於西班牙人對於中國資訊的渴求，讓這些華人覺得如果能將一張中國的地圖帶至馬尼拉，將會是一個有利可圖的「買賣」，於是在1574年年初一艘前往馬尼拉貿易的中國商船，為西班牙人帶去了這張《古今形勝之圖》。

1574年七月底Guido de Lavezaris在寫給西班牙國王的十一頁書信中，除了報告菲律賓群島的相關概況外，還提到了「華人如同往常般每年來此貿易，並且受到良好的對待，他們提供我們許多東西如糖、麵粉、大麥、核桃（nueces）、葡萄乾（pasas）、梨，以及柑橘、絲綢、細磁（porcelanas ricas）、鐵與其它一些在他們到來前，我們在此地缺乏的小東西。今年這同一批的華人給了我一張中國海岸（costa de China）的圖（figura），因此寄給陛下您」。²¹而信中所提的這張圖，便是現存在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這張《古今形勝之圖》。

三、《古今形勝之圖》及其今日的特殊性

西班牙人從華人獲得的《古今形勝之圖》，整張地圖的內容，如同地圖右下方方塊內的文字所言：「欲便於學者覽史，易知天下形勝，古今要害之地。」因此，基本上該地圖上的資訊，可以分為地理與歷史兩個部分。

就地理部分，它所圖繪的地理空間，大致上包括了今日的東北亞與東南亞，在陸地的部分，東北邊由上而下是從今日俄國的海參威一帶，往下到韓國，中間由北而南則是蒙古、中國，而到東南亞的越南及柬埔寨，還有現今已經被越南併吞的占城（Champa）。西北方則是從現為中國領土的新疆、西藏，西南邊則是到被中國人稱之為「大食」的阿拉伯世界，至於中國人稱之為「天竺」的印度，則被錯置在大食的上方，並沒有與看似可能是印度洋的海洋相連接。較為特別的是，地圖的左邊中間，有一個像「葫蘆」的紅色圖形，這

²⁰ 見 Gaspar de San Agustin, O. S. A. *Conquistas de las Islas Filipinas*(1565-1615), LIBRO 2, CAPÍTULO X, 367-369.

²¹ A.G.I., Filipinas 6, R. 2, N. 21.

是中國人認為的黃河發源地，也因此可以見到一個細細的紅色絲帶，曲折地向東延伸直到大海，至於此紅色，並不是《古今形勝之圖》印刷時便有的，而是有人後來加上去的。

而在有關海洋上島嶼的描繪，則可見到被放到地圖正東方的日本，然後以順時鐘方向，繪入琉球及一些類似礁石的島嶼，地圖的南邊海域則繪有爪哇、三佛齊（今日的蘇門答臘島）以及渤泥（Borneo），東南邊的印度洋上，也繪有一些類似礁石的島嶼；但顯然地中國人對於海洋上的地理資訊，並不是非常重視，所以許多不清楚其資訊的島嶼，只能以礁石般的島嶼來簡化，如西班牙人所抵達的菲律賓群島，在此地圖中可能就是琉球左邊，自海中伸出的五座礁石。除此之外，錯誤的資訊亦出現在此地圖中，此地圖下方爪哇、三佛齊及渤泥這三個島嶼的位置，應該放在北方的渤泥，反而被錯置在爪哇的西邊。

至於歷史及行政劃分資訊方面，對於西班牙人而言，最重要的資訊，可能是地圖右上角所記載的，當時大明的行政管理機構名稱與數量，以及左上方所記載的中國傳統世界觀。而對於行政區域的劃分，如兩京、十三省則是用雙線的大方框來標明，其他的城市則是用單線的方框來標明。而從韓國上方一直橫跨到地圖左方的雙虛線，則是今日世人皆知的萬里長城；對於中國境內的一些特殊的地方，繪圖者也因其喜好，加上了一些有關歷史人物或事跡的資訊。除此之外，《古今形勝之圖》上對於一些國家如韓國、日本、琉球，以及傳統中國所認知的北方或是西方的民族等等，其歷史沿革以及與中國的關係，也都有簡要的陳述。

最後，還有一些中國人想像中的國家或族群，如羽人國、女人國及穿胸國等，則是放在地圖的最東南方，離中國最遠的海洋上的一個方塊中，寫上「國多不克盡列」，來留給人們無限的想像空間。也因此，《古今形勝之圖》不只是一幅圖繪中國的地圖，也可以說是明代中國人觀點下的「世界」地圖；同時它也是一張簡要的歷史地理地圖，用來滿足明朝人對於地理知識與「世界」風土民情的渴望。²²

²² 藝術史學者如柯律格（Craig Clunas）將《古今形勝之圖》歸類為「用於室內陳列的大幅裝飾性地圖」，強調該圖的視覺性；見柯律格著，黃曉鵬譯，《明代的圖

按理而言，《古今形勝之圖》其地理學的知識及運用，皆不若同時代的《廣輿圖》，²³那麼究竟今日收藏在西班牙印地亞斯總檔案館的《古今形勝之圖》，有哪些特殊之處呢？首先，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所藏的這幅《古今形勝之圖》是現存在檔案館或博物館內的孤本，可能連中國境內也都找不到第二張，其珍貴可想而知。第二，《古今形勝之圖》並不只是一張有關中國地理知識的地圖，事實上它所呈現的是，自鄭和艦隊到東非之後，葡萄牙人到中國之前，中國人的東亞與世界觀，同時它也載有許多簡要的歷史資訊。最後，就是當西班牙人得到這張地圖後，為了瞭解這張地圖上的資訊，透過奧古斯丁神父與華人翻譯，在地圖正面寫下的西班牙文註解，以及一份有關此地圖內容摘要的報告；如今已成為我們瞭解彼時西班牙人搜集中國資訊的關注點，同時也為西班牙與中國第一次交流的過程，留下兩個不同語言與文化最早的接觸痕跡，自然亦是語言學及歷史學研究的珍貴史料。

四、文本與譯本的差異

究竟西班牙人從華人翻譯得知的《古今形勝之圖》資訊，與《古今形勝之圖》地圖上所陳述的資訊，有無差別呢？華人譯者告訴西班牙人的資訊都是正確無誤的嗎？或許將原西班牙文譯本再譯回中文，再與圖上的中文兩相比對，將有助於史學界瞭解當時西班牙人對於此地圖的「所知」程度。因此，接下來筆者便以Guido de Lavezaris寄回西班牙的西班牙文信件為說明基礎，依信件的內容及順序，配合《古今形勝之圖》上的中文，來分別加以說明。其信件原文如下：

像與視覺性（*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89。

²³ 任金城對《古今形勝之圖》及《廣輿圖》做了比較，他認為沒有比例尺及坐標網格的《古今形勝之圖》，其地理學的重要性不若《廣輿圖》；但《古今形勝之圖》著重於地名及行政區域的沿革，因此整個地圖內容的呈現，較著重於歷史性，見任金城，〈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 214。余定國（Cordell D. K. Yee）著，姜道章譯，《中國地圖學史（*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34-35。

華人 (chinos) 帶來一張在他們國內刻版 (molde) 印製的印刷品到此〔馬尼拉〕城，〔地圖〕上面繪有中國陸地及其鄰近的一些島嶼，並且還有許多漢字 (letras) 來說明地圖。試圖瞭解地圖上的文字說些什麼，於是將圖帶來的那些華人透過翻譯 (interpretes) 來解說，並在圖上依序做出標示，以便將來看到此地圖的人，能夠理解圖中文字的涵義以及它們所表達的意思：

在地圖的北方頂端寫有六個大字〔古今形勝之圖〕，意為「大明唐山 (Tayhin Tunçua)」或今古華夏城池描述 (descripción)。

這片廣袤土地的東方被稱為「九夷 (Quiuhi)」；而南部的地方是「八蠻 (Paoban)」；西方是「六戎 (Diogion)」；北方則是「五狄 (Gautec)」，根據過去所知，國王下令分為兩座首府 (cabecera) 與十三個王國 (reino)。²⁴

雖然這片土地如此廣闊以及可見到難以數計的人民往來各處，並且改變許多的王國 (意指省分)，管理這些民族 (nacion) 稱為歷代 (Distay) 統治的順序。它改變這些城池與鄉村以前的格局。上述為標有一個希臘字A的那個角落的文字內容。

事實上，在標上A的角落裡，其中文為：「東方九夷，南方八蠻，西方六戎，北方五狄，覽此圖，當先以本朝兩京、拾參省。海宇為定□，次番禺貢九州地□□，後觀歷代所睹□，□易於詳矣。」

由此可知，最初華人與西班牙人之間的溝通，是存在很大的困難，因此連「九夷」即東邊的九種蠻族，也無法譯成恰當的西班牙詞彙，只能以拼音的方式來直譯成西班牙文；至於原文中的「後觀歷代所睹□」，似乎華人翻譯也無法與西班牙人就「歷代」一詞達成良好的溝通，因此只好以音譯「Distay」來詮釋「歷朝各代」，至於「□易於詳矣」，應就是「一目瞭然」之意，但西班牙文卻是「它改變這些城池與鄉村以前的格局」，原文與譯文的內容，差距頗大。

標有一個B的那個角落內的文字，內容如下：

²⁴ 按地圖原文為「兩京十三省」，但華人翻譯似乎還不會恰當地使用「省 (provincia)」這個西班牙文字，或是西班牙人的理解有差異，所以譯成「王國」。

在此海中。生有八種高度約半罇 (braza)²⁵ 的多刺海草。同樣有一寬廣的陸地，另外還有五座狀似印章 (sellos) 般的島嶼，旁邊的城市住著非常勤勞的人民，且蘊藏豐富的白銀 (plata)，人稱「天方國 (Tian Hoc Cop)」，²⁶ 那裡的人熟知日期、年分和季節變化。他們與中國之間互通往來。橫越此城市得花上一天半或兩天的時間。儘管這些人治理得井然有序，卻沒有文字。很久以前，他們沒有屋舍，如今已住在建有圍牆的村落中。還有其他許多人煙密佈的地方，卻無從得知。

方塊內漢字為：「其海內有百花²⁷、彭亨²⁸多國，皆朝貢，難於盡列，惟榜葛刺²⁹其國最大，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民以耕植，國鑄銀錢。天方國四時皆春，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默德那國³⁰即回回祖國也，其書體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皆用之，有城池宮室，與江淮風土不異。」

這一段文字與西班牙譯文相對照，便可看出西班牙的譯文有如「胡言亂語」般令人不知所云，如「五印度國」譯成了「五座狀似印章般的島嶼」，「國鑄銀錢」則譯成了「蘊藏豐富的白銀」，「其書體有篆、草、楷三法」譯文中「卻沒有文字」，「有城池宮室」則譯成了「他們沒有屋舍，如今已住在建有圍牆的村落中」。這一部分的西班牙文譯文，幾乎皆與原漢字的內容相背離，不知是因為漢人翻譯對於此部分的地理知識缺乏，或是因為這些地理名詞太過專業，此階段雙方的知識體系，仍存有許多障礙難以進行轉換或理解，因此無法適當的翻譯，所以造成西班牙文與原文的莫大差異。

標有字母C處之中文字說明如下：

²⁵ 一罇約等於 1.6817 公尺。

²⁶ 即麥加，請參考〔明〕馬歡著，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頁 68-72。〔明〕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1），後集，頁 25-27。〔明〕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44-46。

²⁷ 在爪哇島西部的加拉瓚 (Krawang) 一帶。

²⁸ Pahang，位在今馬來西亞半島東岸。

²⁹ 今孟加拉。

³⁰ Madinah，即麥地那。

從泉州 (Chuin Chui) 對面一直往東是琉球 (Lenquio) 島，該島〔的人〕向福建 (Ho Quian) 與福州 (Ho Chuy) 城納貢，但在漢 (Han) 王與魏 (Gui) 王的時期並無繳納貢賦。目前該地分為三個省分 (provincias)³¹。目前受到一名由中國國王 (rey) 指派的君主 (señor) 統治著，當〔該君主〕他死後將再由其他人遞補繼任。每三年納貢一次。

方塊內為：「琉球，其國在泉州東海島中，朝貢由福建來，自漢魏以來，不通中華，元使招諭不從，國初其地分為三，今併為一，國無賦斂，不知節朔，視月盈虧以知時，視草榮枯以計歲。」

有關琉球的西班牙文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後可發現，從文本前面一直到「國初其地分為三」，雖譯的不見得正確，但基本上是照著原文來翻譯，之後「今併為一」到段落最後的「視草榮枯以計歲」，譯者都沒有翻譯，而是自行添加了新的資訊，即是琉球新國王登基時需要明朝派遣使節冊封，以及多久一貢的問題；只是顯然的，華人譯者所提供的琉球「每三年納貢一次」資訊，也是與事實是有差距的。³²

標有字母D處之中文字說明如下：

在這個島上住有許多矮人³³，也有兩層高大小的人³⁴，當中國人看到他們，他們便逃逸無蹤。另外還有野人 (salvaje)³⁵、長有羽毛 (pluma) 的人³⁶、沒有男人共同生活的女人³⁷、在胸部中間穿了一個洞 (agujero) 的人³⁸，以及其他未知的人種。

³¹ 按理此處應譯為「王國 (reino)」，來相應十二到十五世紀初琉球的「三王時期」，但西班牙文卻用了「省分 (provincia)」這個字。

³² 據中島樂章的統計，1540 年至 1566 年之間琉球來大明朝貢計十六次，頻率幾乎是每三年朝貢兩次，與華人翻譯的說法有些差異，見中島樂章，〈14-16 世紀，東アジア貿易秩序の変容と再編——朝貢体制から 1570 年システムへ——〉，《社會經濟史學》，76：4 (2011)，頁 9。

³³ 意指矮人國。

³⁴ 意指長人國。

³⁵ 意指野人國。

³⁶ 意指羽人國，但原中文為毛人國。

³⁷ 意指女人國。

³⁸ 意指穿胸國。

方塊內為：「其海內有小人、長人、毛人、女人、川（同穿）心等國，多不克盡列。」這一段只有將「毛人」似譯成了「羽人」，另多譯了「野人」，基本上算是譯文與原文差異最少的一段。

在字母E處之〔中國〕文字的內容如下：

天底下所有中國的領土都已描繪在此，看懂了這幅地圖（carta）就能認知所有的中國城池。這裡有良田也有惡土，並且都畫在這裡。這裡有好人也有壞人。法律會把惡人變成好人。這片土地是如此遼闊，即使是一個再懂的人，也無法走遍所有〔土地〕。這裡只是〔記載〕那些大的城池，而那些小的〔城池〕則仍是未知。

方塊內為：「依統誌³⁹集此圖，欲便於學者覽史，易知天下形勝、古今要害之地，其有治邑，原無典故者，不克盡列，信豐甘宮編集。」這一段除了前兩句勉強算是按照中文的原文翻譯外，後面看似錯譯的字句，卻又找不到譯者是根據那一句中文原文錯譯？反而像是譯者的「自我表述」，當然也有可能是西班牙人不懂華人譯者的「西班牙文」，而寫下的「自我詮釋」。

標有字母F處之中文說明如下：

此日本（Xipon）島周長五千里（diis），相當於五百里格（legua）⁴⁰長。此地的人使用漢字。在過去他們被〔中國人〕稱之為倭奴（Hulnon），〔該地〕有眾長官（gobernador）〔統治〕或超過百餘國（quo），每個地區約有五十里格。先前不斷和中國人發生戰爭，後來又前去〔中國〕納貢。另一次他們曾發動長達三十年的暴動，許多人變成了海盜，為害一方，後再次歸順，前去寧波（Lionpo）城納貢。鄰近中國陸地〔寧波〕有一蕞爾小島⁴¹，據說那裡的人都非常歹毒。

方塊內為：「日本，其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因近日而名，俗重儒書。古倭奴國，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

³⁹ 疑是「一統誌」。

⁴⁰ 一里格約 5.5 公里。

⁴¹ 應是指舟山群島中的六橫島，參見王慕民，〈明代雙嶼國際貿易港港址研究〉，《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2：5（2009），頁 64-68。以及金國平、吳志良，〈Liampō 綜考丙稿——從雙嶼門到澳門〉（待刊稿）。

百里，漢武帝定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三國、元征之不克，朝貢由寧波來。」這一段落的譯文與原文雖不盡相符，但大致上譯文是跟著原文翻譯，只是華人譯者又根據其自身的見聞補充了一些新資訊，如提及「長達三十年的倭亂」等。

置於海中間的那些中文字，其字裡行間的意思如下：

在標有字母g的地方，此一海灣經常〔有船隻〕航行，而在起大暴風雨時則無法航行，得繞行一大圈才行。

方塊內為：「成化壬辰興漕運，由此路三五日至成山，甚便。今從閘口，海運不通。」對照譯文與原文可知，譯文基本上是來自華人譯者的詮釋，與原文幾乎沒有關聯；但不可否認，在中、西初接觸的過程中，華人譯者實很難將「成化壬辰」，轉譯成西方以基督誕生為紀年的年代，亦或將「漕運」此一中國特有的物資運輸體系，轉譯成西班牙人能懂的詞彙，但又總得譯上幾句，於是就成了我們現在見到的與原文無關的西班牙譯文。

字母H處的那些中文字其說明如下：

箕子（Quisuhu）據說是被周公（Ehuicon）的長兄⁴²派至此地，之後〔該地〕與「安東（Antias）」⁴³一地一起被征服，而被稱為「朝鮮（Tiasian）」。
之後被另一個暴君（tirano）⁴⁴征服，而將其土地被分為四個地區⁴⁵，稱之為「高麗（Toutias）」，並安派長官〔統治〕。當其年邁時，來了五個民族並且征服之，中國人最後取得〔該地〕，並且分配〔其領土〕統治該地。〔該地〕長約四千里，約是四百里格，至於寬則東西約是兩千〔里〕。

使用漢字。

方塊內為：「朝鮮，箕子所封之國，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漢武帝定朝鮮，分四郡；唐征高麗，置安東都護府；五代時王建闢土，□古新羅、百濟為一。其地有八道，分統府、州、縣，地廣東西兩千里，南北四千里，北□女直。俗柔謹，喜讀書。」

⁴² 即周武王。

⁴³ 原文寫作「antias」。

⁴⁴ 應該是指漢武帝元封二年（西元前 109 年）征討朝鮮。

⁴⁵ 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以及臨屯郡」。

把原文與西文對照後，即使是現代具有中國歷史知識的西班牙人，應該也很難理解這些中文翻譯成的西文涵義，更別說當時對中國歷史一無所知的西班牙人，所以雙方翻譯與理解的過程，只能說多數是建立在猜測與自我想像的建構上。

在地圖上有一些彩色的線條，據中國人所說是表示河流，它們都源自一座小湖(laguna)。該湖的水以紅色(bermeja)標示，湖名叫「星宿(Suiguan)海」。周圍約略有百里或更長一些。該湖因水洶湧不斷而翻騰滾滾。人們飲用此水。水湍急。可航行至此湖以及其各地的支流。因水流過強，一些水域可航，另外一些則無法。整條水流皆甚深且水面寬約四里格。部分地方可航行運送糧食的大型船隻。

這裡的字，因為原件破損較嚴重，所以能辨識的文字為：「黃河源，在崑崙山之南，其□方七八十里〔破損〕……，水從地湧出百餘，□□從東北望若星列，番名火墩〔破損〕……至陝西蘭縣始入中國，東北流經沙漠，折而南流□山西，過河南經山東入海。」由於原圖破損的相當嚴重，許多原文的字句無法辨識，但總的來說，西班牙譯文仍大致上是華人譯者的表述，而不是按照原文翻譯，因為譯文裡完全沒有提及「黃河」與「崑崙山」，或是黃河流經沙漠、山西及河南等地，最後在山東入海一事；反倒是提到與原文無關，有關黃河寬度或航行情況的問題。

在字母H處旁邊的一些文字，其說明如下：

遼東(Lianton)地區，緊鄰一長的城牆(cerca)。從東到西約千里，約一百里格，而北南則是一千六百里。

方塊內為：「遼東都司，古有郡縣。唐太宗征遼，自五代梁初歷宋四百年，皆沒于遼金元。天命歸我朝，罷郡縣，立衛所二十五處，設州二。古曰遼陽，遼金起都。東西千餘里，南北一千六百里。本朝雄鎮，加設都台，□隸山東。」有關遼東的內容，顯然地譯者把複雜難譯的遼東歷史沿革都省去了，並首次提到了長城的城牆，其它的部分，只翻譯了遼東地區的面積長與寬；但華人譯者將華人所使用的里，換算成西班牙人的里格，倒還算是正確，因為千里約等於五百公里，一百里格約等於五百五十公里，所以差距不大。

接下來，這裡的西班牙文敘述，都是華人譯者的說法，在地圖上是找不

到這些中文敘述。

位在地圖的北邊位置〔古今形勝之圖〕大字旁，有一由東至西的一道線，寫著「城牆（muralla）」。⁴⁶此城牆，〔馬尼拉的〕華人說，是為了要區隔中國與韃靼（Tartaria）或西狄（sitia）疆土之用。

〔城牆〕約長一千里格，寬約六十呎（pie）。〔城牆〕高度大約是十二艾斯塔度（estados）⁴⁷。該圍牆是以石灰（cal）與石塊（canto）建成，有非常高聳的塔樓，據中國人所言，從塔上〔往下看時〕，人都變得好渺小。此城牆上⁴⁸有中國守軍，沿著長長的圍牆看守，以防韃靼人〔入侵〕。為了築起如此巨大的城牆，據華人所言，城市裡每十名男子中就要選出四名。中國各地所有人都來築城，以抵禦常來駐軍前劫掠華人的韃靼人。從此張地圖上看來，幾座山巒那邊的土地上居住著韃靼人，圍牆內是中國，有三個駐有軍隊的要塞，它們的名稱如下：一個是雁門關（Ganbun Quan），另一個是大同關（Tai Tonquan）以及山海關（Çanay Guan）。⁴⁹據華人〔所言〕，每座要塞上都配備有許多物資。此說此處無記，故不在此贅述。

在地圖上還有一些寫在方框中的文字作為記號的。這些是王國的首府，也就是副王（virrey）們居住的所在地，總共有十五個省分。

據華人說，約四百八十年前有一位國王從南京（Lanquian）省起家，統治了所有的土地，然後其血脈（linaje）持續掌控統治著他取得的江山至今。兩年前，那位被稱為「隆慶（Leon Quen）」的國王過世，留下了他十三歲的兒子，被稱為「萬曆（Han Lic）」，今日〔繼續〕統治著從海邊地區的福建（Ho Quian），到王宮所在的北京（Pa Quian）。兩地之間驛站的路程長約一百二十里格。每里格更換一驛站。

葡萄牙人遣使前往晉見國王走的也是驛站。

⁴⁶ 即長城。

⁴⁷ 一艾斯塔度（estado）約等於七呎，約為一點九五公尺。

⁴⁸ 原西班牙文為「fuera」。

⁴⁹ 榎一雄的文章中，僅將西班牙原文照抄，沒有找出原中文的所指；筆者對照原圖後，發現「山海關」、「大同關」以及「雁門關」旁，皆有西班牙文小字，故確定此處的西班牙文譯文即為此三處關口。

上面的譯文，相對於Gaspar da Cruz的《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述》一書中，⁵⁰對長城的簡短記載「在中國人和韃靼人間有一道長約一百里格的牆，有人甚至肯定地說它超過一百里格」，⁵¹相對而言，西班牙人所得到的「萬里長城」資訊，顯然是更為詳細的。

西班牙人對於長城似乎是相當有興趣，因此還對照了《古今形勝之圖》的原圖，並在雁門關、大同關及山海關的位置，特別標上了西班牙文的拼音字來做記號。另外，這裡也首次出現了葡萄牙人的資訊，提到1520年葡萄牙使節Tomé Pires從廣州前往北京行的路線。⁵²後面，我們還會在地圖上，看到有關葡萄牙人在中國的資訊。

Y處的角落那些中文字，其說明如下：

在中國土地上有一百五十五名總督（governador）⁵³，或是如他們所稱的「Enis」⁵⁴，而總督之下還有另外的兩百五十名行政長官（magistrado）⁵⁵，被稱為「Huy」⁵⁶，其下的官員的被稱為「Quines」⁵⁷，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九名。在此之後還有被稱為「Guebe」⁵⁸的〔官員〕，共有四百九十三

⁵⁰ 收入於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C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953), 44-239. 中文譯本有，克路士（Gaspar da Cruz），〈中國志〉，收入 C. R. Boxer 編注，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33-170。以及金國平從葡萄牙原文節譯的版本，參考金國平編譯，〈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述〉，《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 195-212，中文學界若要直接瞭解該史料，金國平的葡譯本較英譯本為佳。

⁵¹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C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70.

⁵² 有關葡萄牙使節的上京之行，請參考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頁 56-59。

⁵³ 指知府。

⁵⁴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府」。

⁵⁵ 指知州。

⁵⁶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州」，但數字顯然有誤，應為兩百三十八，而不是兩百五十。

⁵⁷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縣」，指知縣。

⁵⁸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衛」。

名，又有隸屬於他們的〔官員〕，共有兩千八百五十四名⁵⁹。另有其他被稱為「Sanaya」⁶⁰的〔官員〕十二名，其他被稱為「宣撫司（Sanbusi）」的十一名。另外「招討安撫司（Chianto Anbuci）」，共十九名。

其他的被稱為「長官司（Tian Quan Si）」，共有一百七十七個。所有這些〔機關〕⁶¹管轄著其他所有的中國人，並且互相監督。⁶²

在右上方的方塊內為：「府，壹百伍拾伍；州，貳百叁拾捌；縣，壹千壹百貳拾玖；衛，肆百玖拾叁；所，貳千捌百伍拾肆；宣慰司，壹拾貳；宣撫司，壹拾壹；招討安撫司，壹拾玖；長官司，壹百柒拾柒處。」這一部分的譯文與原文相對照後，有一較特別的現象，即有許多明朝行政單位的西班牙文拼音，與原文有很大差異，如「衛」的首長被拼音為「Guebe」，卻沒有拼出單位名稱等等，甚至還出現西班牙文譯音與漢字無法相符，或數目有所差異之處。不知是不是因為時間緊迫，受限於菲律賓總督Guido de Lavezaris急於將地圖及文件，配合船期寄出西班牙母國，因而在看似較容易翻譯之處，反倒出現讓人無法理解的錯誤。

整體而言，這些西班牙文資料都是根據《古今形勝之圖》上的相關中文說明來進行翻譯的，但是也可以從西班牙文譯文中，看出在此一西班牙人與華人接觸的初期，由於對彼此的語言仍有些陌生，所以在翻譯的過程中，總是正確與錯誤的資訊參雜在一起，有一些可能是屬於較複雜的歷史內容，譯者就忽略而不翻譯，或是「顧左右而言他」；也有些地方的翻譯謬誤，讓筆者對於到菲律賓的華人中文程度，有些存疑，如「五印度國」譯成了「五座狀似印章般的島嶼」，似乎是華人把「印度」中的「印（India）」翻成了「印章」中的「印（sello）」，這樣的錯譯，實在有些讓人摸不著頭緒。

從這些翻譯上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出中、西雙方在初接觸的階段，對於屬於各自傳統與悠久文化層面如歷史、宗教等深奧的問題，華人無法譯出時，只好以拼音的方式告知西班牙人；而對於大明仍相當陌生的西班牙人，

⁵⁹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所」。

⁶⁰ 對應《古今形勝之圖》，中文應為「宣慰司」。

⁶¹ 這一些機關名稱，在譯文裡顯然皆被西班牙人錯誤的理解為官員名稱。

⁶² A.G.I., Filipinas 6, R. 2, N. 21.

其理解只能以自己所知的知識體系來理解中國這個「他者」，因此西班牙文說明中存在著許多疑惑與不解，如「天方國」即為麥加，西班牙人只能以拼音來翻譯。不過，綜合而言，1574年西班牙人所寫下的《古今形勝之圖》相關資訊的譯文，已大致上掌握了中國境內以及東亞海域的一些資訊，為西班牙人的後續「漢學」發展，奠下一個有利的基礎。

五、《古今形勝之圖》上的新史料

如前面已提及的，印地亞斯總檔案館在2007年將《古今形勝之圖》修復完成，並完成其數位化典藏工作；也因此筆者得以在館方的協助下，調看原件及數位檔資料，檢視該地圖正面部分未曾被發表過的西班牙文資料，也就是1574年西班牙人直接在《古今形勝之圖》上，所寫下的一些細小、難辨識的西班牙文說明。

這些西班牙文的資訊，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輔助理解這張地圖上中文資訊的西班牙文說明。例如在地圖大標題「古今形勝之圖」六個字的上方，寫著「這些在方框裡的都是十五省分的首要城市，只是其中兩個才是國王的所在，即是北京與南京。該處都是由有血脈相傳的國王所居住，目前的〔國王〕則是稱為『萬曆（Qua Li）』，他現在十三歲，他的父親兩年前過世，而他被稱為『隆慶（Li Quen）』」。同時，在地圖標題「古今形勝之圖」六個字的上方，個別寫上西班牙文小字來說明此地圖的標題意義為何，西班牙文的意思則為「唐山（Tang çua）或是古往今來中國域內城市的描述」。

這一段的西班牙文說明，基本上與Guido de Lavezaris寄回西班牙母國信件中，所附的西班牙文說明內容是一致的，只是在拼音上有些差別，如「萬曆」在該說明中拼為「Han Lic」，「隆慶」則是拼為「Leon Quen」，顯見在初次接觸的過程中，西班牙人對於他們首次接觸到的閩南語，如何轉化為羅馬拼音，仍在揣摩中尚未尋出規律。

另外，為了要讓在西班牙本土的人能理解這張圖上，寫有文字的大小方框其符號的意義，因此西班牙人在上述的這段文字旁邊，畫上了一個雙線的大方框，然後寫上「這些城市都是『布政使（ponchencies）』，共有十三個」，

然後在旁邊又畫上兩個更小的方框（其中一個似乎是畫壞了，於是西班牙人再補畫了一個），寫上「這些在黑色框線內的……（破損）城市，都是隸屬於布政使的」，而這些資訊都是Guido de Lavezaris的西班牙文說明中沒有的。

此外，為了要能理解這張地圖的東西南北方位，西班牙還請華人在地圖的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方及東北，寫上西班牙文並以閩南語拼音來對該方位加以說明，例如東、南、西、北方的說明，分別如下「這條線是北方，在中文中發音為『北（panc）』；這條線是西方，在中文中發音為『西（çe）』；這條線是東方，在中文中發音為『東（tang）』；這條線是南方，在中文中發音為『南（lan）』」。除此之外，華人譯者還在《古今形勝之圖》的四周，標上了「甲、乙、丙、丁……」天干地支來標示方位，但或許是西班牙人無法理解此概念，因此並未將這些漢字譯成西班牙文。

第二類資訊，則是有關中國境內物產的資訊。這些資訊皆是《古今形勝之圖》上沒有記載的資訊，因此可能是西班牙人主動向華人詢問，有關他們攜來馬尼拉的商品出自於中國何處？並請華人在地圖上指出其具體位置後，才被西班牙人寫入地圖上的。

這樣的文字記載共有六件，第一件是在四川成都府的下方寫上「這裡是四川省（Tzu çan），有許多……，並有中國最好的麝香（almizcle）」。（見圖標1）⁶³根據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中華大帝國史》⁶⁴中的記載，在其第四章談到中國的物產時，便提到中國的「麝香產量非常豐富」，而「大黃（ruibarbo）特別的好」，⁶⁵由於四川北部也是大黃的產地，因此筆者揣測字句中看不清楚的西班牙文，或許便是大黃，而這兩種物產，也是葡萄牙人Gaspar da Cruz在《中

⁶³ 原文為「Es esta provincia de Tzu çan. Hay mucho [...] y el mejor almizcle de la China」。

⁶⁴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Madrid: Ediciones Polifemo, 1990). 門多薩的這本經典著作，目前有兩種譯本，分別是致力中外交流史經典譯註多年的何高濟，譯為《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另一本則是由西班牙文直接譯成中文，並譯有數本西班牙大航海時代經典著作的孫家堃所譯，譯為《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如有意瞭解Mendoza一書的完整歷史脈絡，孫家堃譯本則是較好的選擇。

⁶⁵ 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 *Historia del Gran Reino de la China*, 39-40.

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述》書中曾提及的物產，如他提到「中國有大量的大黃」⁶⁶，並認為中國的廣西（Camsi）地區也產有麝香。⁶⁷

其次是湖廣武昌府下方的「湖廣這裡有許多的……（破損），以及很好的良馬（jinetes）」（見圖標2）⁶⁸。由於這段文字因地圖破損嚴重，無法猜出其字義，不過較特別之處，可能是對於仰賴及擅長駕馭馬匹的西班牙人而言，有了馬不但是有了交通與載運的牲畜，也可以說是擁有了戰爭與征服之用的工具。

再來是江西南昌府旁的鄱陽湖右邊，則寫上「景德鎮（Jian Chen）」⁶⁹那裡有好的陶瓷器（loza），並且製造一些新奇的物品」（見圖標3）⁷⁰西班牙文說明所標示的位置，相當準確，雖然Gaspar da Cruz在1569年便指出中國的瓷器產自江西，但並沒有指出更精確的地點；⁷¹所以《古今形勝之圖》上的文字記載，或許是歐洲人最早指出中國優良磁器產自江西景德的史料之一。

另外，還有兩行小字，分別在鎮江附近標上了「這裡建有……（破損）寶塔（pagoda），……（破損）-cido」（見圖標6）⁷²；由於「fabrican」⁷³在西班牙文字義裡有生產或建造之義，因此筆者推測此處可能指的是鎮江著名的江天禪（即金山）寺中的慈壽塔。至於蘇州及太倉一帶，則寫上了「有水八角（graciola）」⁷⁴，

⁶⁶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C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127.

⁶⁷ 拼音為「Camsi」，但按文意應指廣西。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C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76.

⁶⁸ 原文為「Aquí hay muchos [...] ju guen [...] y buenos jinetes」。

⁶⁹ 若以拼音「Jian Chen」來看，似乎是江西鄱陽湖西南邊的「吉安鎮」，但西班牙人又將該文字敘述置於鄱陽湖東北邊饒州的上方；或許是華人譯者與西班牙人在溝通時理解有所偏差，導致拼音與地點不符的問題，本文暫以其地圖上的位置及物產磁器為準，譯為「景德鎮」。

⁷⁰ 原文為「Jian Chen donde hay la fina loza y se hacen cosas curiosas」。

⁷¹ 不過Gaspar da Cruz有時將江西拼為「Camsi」，有時又拼為「Sanxi」，見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C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Fr. Martin de Rada, O.E.S.A. (1550-1575)*, 90-91.

⁷² 原文為「Aquí se fabrican [...] pagoda [...] -cido」。

⁷³ 原形動詞為「fabricar」。

⁷⁴ 此處可能為「graciola」的誤寫，因此譯為「水八角」。

有織布(lienzo)⁷⁵」(見圖標5)；由於華人帶給西班牙人的商品中有絲綢，所以向華人詢問絲綢的產地，亦是相當合理的，但是為何西班牙人要將這種秋海棠科植物「水八角(gracioda)」資訊寫入地圖？經筆者查閱相關時代的西方文獻記載，似都未曾及到水八角，因此「gracioda」一字極有可能是某種物產的翻譯理解失真或筆誤，所以目前暫無法獲知其原本的真正字義。

最後，在河南陳留(即開封)及汴梁一帶，似乎也有西班牙人關心的物產，因此西班牙人亦在圖上寫上了小字(見圖標4)，可惜原圖此處破損的更為嚴重，已完全無法辨識，因此很難得知其字義。

第三類，是比較屬於地理、軍事或重要情報的。首先是在地圖的下方，有三個島嶼由東而西，分別是爪哇、三佛齊及渤泥。這三個島嶼在此《古今形勝之圖》上的地理位置，明顯是有錯誤的，事實上渤泥應該是放置在爪哇島的東北方(即右上方)，但在《古今形勝之圖》中渤泥反而被錯置在最西方；但有趣的是，西班牙人在此三個島上註上的西班牙文小字，卻是正確的，不受到地圖上錯誤資訊的影響，分別是「Java」、「Zumatra」與「Bornei」。而明代華人所稱之「三佛齊」，亦能被西班牙人正確的寫成西文拼音的「蘇門答臘(Zumatra)」，亦顯見西班牙人對東南亞的地理資訊，已有一定的掌握，方能在中文資訊錯誤或不足的情況下，辨識出正確的地理資訊。

其次，則是在長江口的崇明島附近，寫上了「上面是『揚子(Gonmcuy)〔江〕』，下面是『江(Cyan)』」。(見圖標7)⁷⁶再往上則是在山東的登州旁，寫上「登州地區人員稀少」。(見圖標8)⁷⁷這兩個地理資訊有一點特別之處，即是兩個地點都算是軍事要地，特別是西班牙人在登州處寫上「人員稀少」，可能指的是駐軍稀少之意；再加上《古今形勝之圖》上將山東畫成被河流所隔開，看起來似一個島，又臨近北京，難免讓人對於西班牙人記下此資訊，是有某種軍事企圖的聯想。

最後也是最特別之處，則是在地圖正下方的香山縣，標上「(破損)葡萄

⁷⁵ 原文為「hay gracioda [...] hay lienzo」，「lienzo」可能就是後來歐洲人所稱的「南京(Nanquen)布」。

⁷⁶ 原文為「arriba Gonmcuy, abajo Cyan」。

⁷⁷ 原文為「Teng ezia provincia de poca gente」。

牙人在此」。(見圖標9)⁷⁸顯見西班牙人在獲取中國情報的同時，對於此時仍是他們敵人的葡萄牙人及其相關活動，亦是積極打探，因此除了在Guido de Lavezaris的西班牙文說明中提及「葡萄牙人遣使前往晉見國王走的也是驛站」外。甚至在《古今形勝之圖》上，地圖下方正中間的小島「香山縣」方格內，也就是澳門的所在地，亦寫上了西班牙文字，特別標出了葡萄牙人在此的訊息。

六、《古今形勝之圖》西班牙說明的譯者

在1574年七月底Guido de Lavezaris的書信中，⁷⁹提到了借助「一名粗淺理解中文的奧古斯丁會傳教士」以及「一些華人翻譯(algunos intérpretes chinos)」的幫忙下，將此地圖上標有西班牙文字母部分的相關資訊，譯成西班牙文後隨信寄回西班牙本土，成為西班牙首次獲得的較全面性中國與東亞資訊。那麼究竟這些華人翻譯是誰呢？有可能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事實上，中、西方交流史中常見到「譯者」或通事，但往往只是在史料中留下他們天主教受洗後的名字，或是外文拼音的「姓名」；因此不但有關他們個人生平事蹟的描述，相當少見，甚至是「隱形(invisible)」在歷史舞臺布幔之後，連名字都未留下！但歷史之所以令人著迷，就是這謎團般的歷史發展，有時卻又會在某處，給了我們出乎意料與想像的可能答案。⁸⁰

《古今形勝之圖》的譯者，後來便因為另一個對西班牙菲律賓歷史影響甚大的中國海盜來襲插曲，而留下了他們的身影與姓名，那就是1574年十一月底的林鳳偷襲馬尼拉事件。由於林鳳的事件，許多學者已有完整的討論，⁸¹部

⁷⁸ 原文為「Aquí estan [...] portugueses」。

⁷⁹ A.G.I., Filipinas 6, R. 2, N. 21.

⁸⁰ 有關大航海時代華人通事的研究討論，請參考李毓中，〈帝國接觸「縫隙」中的「他者」：澳門學中的華人通事研究回顧與展望〉，《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全球視野下的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以澳門學為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編印中）。

⁸¹ 其中以湯開建近日的研究成果最為完整，見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跡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頁43-65。

分相關的西班牙文史料，亦已有中文翻譯。⁸²因此，此處僅就《古今形勝之圖》的譯者進行討論，為何在林鳳襲擊馬尼拉事件中，會留下了他們的身影與姓名。

從1574年七月底Guido de Lavezaris總督寫信給國王時，提到馬尼拉有懂得西班牙文的「華人譯者們」，不久1575年初明朝官員王望高因追蹤林鳳的蹤跡來到馬尼拉，因見到西班牙人擊敗林鳳，並將其封鎖於馬尼拉北方之馮嘉施蘭（Pangasinan），因而應菲律賓總督之請，攜帶Martin de Rada一行人與他一同回到福建。

據西班牙文的史料記載，同行的還有兩位在馬尼拉居住且懂得西班牙文的華人「Sinsay」與「Hernando」。⁸³那麼「Sinsay」與「埃爾南多」是何許人呢？有無可能知道他們的中文姓名與事跡呢？幸而明朝的中文史料裡，給了我們答案。在劉堯誨《督撫疏議》中的〈諭夷勦賊捷音疏〉提到：

〔王〕望高等潛到呂宋，將原帶表裏紬絹等儀物進見呂宋國主，因探知漳州府海澄縣民林必秀一向在番生理，熟識呂宋國主，一同引見。⁸⁴
並番僧二名，一名馬力陳，⁸⁵一名羅里暮；⁸⁶番使四名，一名微倪·賴里駕、⁸⁷一名巴里·褻羅綿佗，⁸⁸一名俚估那·是俱鶯哈，⁸⁹一名患黎·地里安那，⁹⁰通事一名陳輝然，其餘番從一十三人，齎捧呂宋國王主番書及貢獻方物，呈解到臣。⁹¹

⁸² 李毓中譯著，《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一）》（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8），頁141-212。

⁸³ 李毓中譯著，《臺灣與西班牙關係史料匯編（一）》，頁196-207。

⁸⁴ 轉引自，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迹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頁56。

⁸⁵ 「馬力陳」即為「馬丁·德·拉達（Martin de Rada）」。

⁸⁶ 「羅里暮」應為另一名奧古斯丁修士「Jeronimo Marin」。

⁸⁷ 「倪微賴里駕」為「Miguel de Loarca」。

⁸⁸ 「巴里微褻羅綿佗」為「Pedro Sarmiento」。

⁸⁹ 「俚估那微是俱鶯哈」為「Nicolás de Cuenca」。

⁹⁰ 「患黎地里安那」為「Juan de Triana」。

⁹¹ 轉引自，湯開建，〈明隆萬之際粵東巨盜林鳳事迹詳考：以劉堯誨《督撫疏議》中林鳳史料為中心〉，頁60。

而將上述的中文史料與西班牙文獻兩相對照，便可知道被稱為「Sinsay（秀師）」⁹²的人，中文姓名即是「林必秀」，而被稱之為「埃爾南多」的天主教華人，其中文姓名則為「陳輝然」。

林必秀與陳輝然，是否就是《古今形勝之圖》西文說明的中方譯者呢？如考量到，從1574年七月底菲律賓總督Guido de Lavezaris寫信給西班牙國王，交由加雷翁（Galeón）船乘夏日西南風出發順黑潮前往美洲，到該年的十月風向轉為東北季風的這段期間；受到季風的影響，華人船隻很難能再從福建航至馬尼拉，當然也就不會有其他的華人翻譯抵菲。而在十月後風向轉為東北風，華人船隻方可能再度從閩南開來呂宋島，而這也就是林鳳在該年十一月底得以偷襲馬尼拉的原因，如有其他新的華人翻譯前來馬尼拉，大概也只有這約一個月的時間。

再考量到，以Martin de Rada出使中國此一任務之重要性，西班牙人所選之翻譯，必然是他們曾合作過且值得信賴的華人通事，不太可能是一個初抵馬尼拉，與西班牙人仍不太熟識的華人；因此，筆者推論《古今形勝之圖》的譯者之一，應該就是「熟識呂宋國主（指Guido de Lavezaris）」的林必秀，而林必秀之所以熟識菲律賓總督，可能就是協助翻譯《古今形勝之圖》，甚至說不定《古今形勝之圖》就是在他的主導下，從福建被帶到馬尼拉。由於Guido de Lavezaris稱「華人譯者們」，因此另一名譯者應是受洗後取了西班牙名「Hernando」的陳輝然，或至少他們倆人是與奧古斯丁神父（可能是Martin de Rada）一同進行《古今形勝之圖》翻譯的譯者之二，除非馬尼拉城還有更多華人懂得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

最後較為特殊的一點，筆者原認為華人通事為閩南人，所以按理Martin de Rada的中文名字，應該也是以閩南語來拼寫成漢字的，但發現可能並非如此，因為「馬力陳」如以閩南語拼音應是「馬-力-陳（Ma-r-dan）」，顯然有些不符。但如果考量到劉堯誨書寫此文書的地點為福州，當地的官員可能應是以福州話來拼寫西班牙文，「tin」剛好就是福州話「陳」的發音，也就是

⁹² 陳荊和將「Sinsay」譯成「信師」，見陳荊和，《十六世紀之菲律賓華僑》（香港：新亞研究所東南亞研究室，1963），頁37；但或許亦可能是其他閩南人對林必「秀」的敬稱，所以將其譯為「秀師（siu-sai）」。

拼為「馬-力-陳 (Ma-r-tin)」，因此「馬力陳」可能就是「Martin」的福州話拼寫，而不是閩南語。如果筆者的推論成立，那麼便顯示了在中西交流史的研究上，不管是紀錄西方人的中文材料，或是西方紀錄華人的材料，其接觸華人所使用的方言，亦是研究時須多考量的因素。⁹³

結語

1574年西班牙人取得《古今形勝之圖》，距今已近四百四十年，藉由這張地圖的送往西班牙，開啟了西班牙與歐洲對中國內陸與東亞地理知識的初步瞭解，隔年1575年Martin de Rada在王望高以及《古今形勝之圖》華人譯者林必秀與陳輝然的陪伴下，進入福建展開西班牙與中國首次的官方接觸；最後雖在西班牙人圍剿林鳳無功的情況下，喪失了與明朝官方保持正式交流的機會，但是Martin de Rada福建行所帶回的中國古籍，以及他在福建的所見所聞所寫成的報告，後來卻成為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撰寫《中華大帝國史》一書的主要情報來源，開啟了十六世紀末西班牙漢學研究的風氣與成就。⁹⁴

此外，金國平曾提出1584年歐洲出版的第一張中國地圖，《中國新圖》(China, olim Sinarum reginis, noua description) 的作者Luiz Jorge de Barbuda，可能亦參考了這張在1575年被送到西班牙的《古今形勝之圖》，因而獲知了上面的相關中文與西班牙文資訊。⁹⁵關於這點看法，只要將這兩張地圖放在一起，便可發現一些相似之處，如中國的形狀皆為長方形，在山東的部分皆繪成類似「島嶼」狀，但不可否認的是，亦有一些地方是不盡相同的。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做為一個製圖家的Luiz Jorge de Barbuda，想必他在製作《中國新圖》時，應該會同時參考許多有關中國的不同資料來源，而他再根據其專業進行判斷擷取他認為正確的部分，最後再加以整合成這張《中國新圖》，

⁹³ 至於其他的西班牙人名與福州話的關聯，受限於篇幅與能力，筆者在此便不再一一考訂。

⁹⁴ 西班牙漢學的發展歷史，請參考張鎧的經典著作，《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⁹⁵ 金國平、吳志良著，《過十字門》，頁318-319。

因此兩張圖存有些許差異，亦是合理的。

因此，若要斷定Luiz Jorge de Barbuda有無看過或採用《古今形勝之圖》，雖然目前無直接的證據，但只要考證Luiz Jorge de Barbuda替西班牙王室效力的時間，加上《古今形勝之圖》的特殊性，只要人與地圖兩者都曾經在同一個時間出現在西班牙某處，那麼Luiz Jorge de Barbuda看過《古今形勝之圖》的可能性便大為增加；但或許研究的重點不止於此，而是究竟他到底用了多少《古今形勝之圖》上的資訊！？此外，又1555年重刻的《古今形勝之圖》的作者真的是以往學界所認為的喻時嗎？該地圖的資訊來源又是依據什麼材料呢？而這一切皆有待未來更進一步的研究與討論。⁹⁶

總而言之，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所藏《古今形勝之圖》的貢獻，並不僅止於有助我們瞭解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究竟掌握多少中國的地理與歷史資訊；同時它還兼具了「時空膠囊」的功能，為我們保留了西班牙人與華人初次接觸過程中，雙方如何溝通以及相互之間對彼此語言理解的方式、程度與想像；另一方面，也顯示出華人與西班牙人的交流，似乎在初次接觸的兩、三年內，可能在葡萄牙文的基礎上，雙方便能進行基本程度的溝通與「理解」。

此外，在《古今形勝之圖》的西班牙譯文中，雖仍有一些屬於文化深層的詞彙如中國特有的年號或制度，或是特有的中文地理名詞如「天方國（麥加）」等，很難被華人通事翻譯成西班牙文外，其它日常生活的用語，多數還是可以進行溝通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來，在某些深奧的歷史知識或文化的概念上，當華人譯者不知該如何翻譯時，便常會出現錯譯或亂譯，或是「牛頭不對馬嘴」談論其他資訊的情況。而這正好可以呈現出，華人譯者與西班牙譯者在異文化接觸過程中，對於諸多無法理解的概念，如何靠著自身文化的想像或理解，來「建構」出一種西班牙人所能理解的「大明」。

本文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收稿；2013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顏瑞均

⁹⁶ 在西班牙文化部的授權下，清大人社中心取得了《古今形勝之圖》原尺寸的複製出版權，並已於 2013 年 9 月在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正式出版，或許可以說《古今形勝之圖》的研究，事實上才剛要展開一個嶄新的時代。

圖1 《古今形勝之圖》



資料來源：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 MP-Filipinas, 5.

“Making” China: Research on the *Map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古今形勝之
圖》) of Ming Dynasty Obtained by the Spanish in 1574

Lee, Yu-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age of exploration connected new global trading networks and fueled people's thirst in the “making” of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distant lands. After the Spanish established their main colonial stronghold in Manila in 1571, then governor-general Guido de Lavezaris obtained the *Map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古今形勝之圖》) through the aid of Chinese merchants. Later, with help from Chinese translators, an Augustinian father was able to translate the map's literal content into Spanish, and Guido de Lavezaris in turn presented the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map to the Spanish monarch Felipe II for review. The information from this map was Spain's first official comprehen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knowledge concerning China and East Asia.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map should be considered a cornerstone document in understandi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Sinology.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panish acquirement of the map and investigates the tru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who offered their effort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Spanish version. Additionally, the article also strives to explore the Spanish cognitive “making” of Taybin (大明) via the cultural exchange progress between Spanish and Chinese translators through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relevant Spanish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Chinese documents.

Keywords: *Map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China, Spain, Philippines, Chinese translators